

山高水远的文学书写

文/陈建功

读完《布衣壶宗 顾景舟传》，感觉这是徐风创作上的一个大的突破。记得当年我建议大家不要只盯着作品的“轰动效应”，更要盯住作品的“生命力”。也就是说，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作品，在书架上要摆得住。这本书，应该说满足了这种期待。

书名很有深意，贯穿了一个基本的艺术哲理，就是在艺术探求中，手艺人并不卑微，或恰因为他是“布衣”，奠定了他进入经典，成为宗师的基础。紫砂原本就是一抔泥土，经过多少代艺人的传承创新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。顾景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。正如丹纳所说，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来的陨石。在莎士比亚的背后，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。

“道进乎技”，这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哲学命题，徐风通过对“器”与“技”的书写，把一个古老民间手工艺接通了“道”，并通过顾景舟的一生，阐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。让我们知道，什么是知行合一，什么是天人合一，而这两个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从文学的角度说，他写出了一种文

人的风骨气度和手工艺的迷人手感，一种人性的悲悯体恤，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。非虚构文学首先是资料的积累和运用，但凡好的作品会从资料中杀出重围，体现作家的文学秉赋、气质和境界。民族元素，要在绵密的细节中自然流淌出来。徐风把顾景舟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来进行观照，他写出了顾景舟的精神史。徐风说他要贴着顾景舟的心跳写，写出他的气质和肌理。这背后，除了学养的支撑，更有激情乃至生命的投入。顾景舟把一门手工艺臻于至境，通过一系列传世壶艺作品，给我们提供了审美的高境、艺术的享受。他提出“形、神、气”的主张，为手工艺注入了文化的灵魂。这使我想起了老舍先生，早年他的小说也为人诟病，评论说他“失之油滑”，后来老舍去了英国，眼界一开，创作上了大的台阶。顾景舟早年接受了海派文化的滋养，回到宜兴他的视野不一样了。可以说，顾景舟的人生对紫砂界重要，和文学界也是相通的。徐风把文学跟紫砂水乳交融。即文学的紫砂，紫砂的文学。

书中还有大量似与壶艺无关的



“闲笔”，兼及顾景舟的社会关系，那是写人，变换多种角度来丰满其形象。其间有很多的跌宕，富有戏剧性，比如说顾景舟一生看过13把供春壶，都是赝品；但最后一把，因为对方是位风烛残年的老者，他怕说真话对方吃不消，便用了善意的谎言。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还是把真话说了出来。这情节放在小说里，读者会以为是虚构的，但这里是传记，且有日记佐证，读到这里就有一种震撼。这证明传记文学写好了，不输小说的精彩。作为非虚构文学的重要门类，传记文学的写作日渐引人注目，也期待着新的突破。而徐风这部作品，应该是近年来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
风雅从何而来？

文/唐燕

新技术带来的众声喧哗，看似热闹，实则在透支我们内心的丰富和完整，如何修补内在的支离破碎？

一整个上午，我在读育邦的《附庸风雅》，纸质的“沙沙”声，伴随一段段音乐，内心得到妥帖的慰藉。一个“质地饱满的日子”拜阅读之赐，如果没内心生活支撑，弱小的个体随时会被信息席卷而去。

这本诗人的随笔，包括美食、阅读、观影等内容，其中“饕餮”部分，曾在报纸开过专栏，再次翻阅，仿佛温度犹在。读到精妙处，想起身下厨，如法炮制一出人间至味。但诗人不止于技术层面的描述，每道菜的文化底蕴，更是诗人兴趣所在。美食得超越果腹功能，而趋向艺术性，再形而上一点，还能够载之以道——正如他这样写“泰山三白”：“这道菜最妙之处就是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三种出自人工、大地与山川的食材原味，甚至还包含了天地人之间既密切而又简约的澄明关系。”

书中，除了美食关涉物质层面，余者皆是在精神世界版图游走的足迹。美食也并不受缚于舌尖，而是让诗意有了飞翔的可能。风雅从何而来？就是于沉重的肉身之上，琐碎的日常之中，升华出来的审美性生活方式。诗人带给世界的意义，并不在于长短短短的句子，更在于诗意照亮的现实。

“愿意成为诗人的人必须自己就是一首真正的诗”，育邦引用弥尔顿的话，是自谦虽够不上一首诗，但哪怕“不过是留下一道仅仅



适用自己的盲目的印记”而愿继续写诗。其实所谓诗人气质，不是脱俗的外在标签，而是内在的处理方式。诗人，无关职业和身份，“在江上打鱼的渔夫，走向深山幽林的旅人，坐在秋千上摇摆的孩子……在特定的某一刻，他们也都是诗人。”阡陌纵横曲径通幽，下一站可能是塔科夫斯基，也可能是佩索阿，或者是孔子老子，从漫游中驻足的江河山川，可一窥诗人精神谱系的源流。

即使收获了精神果实，这种悠游，也必须漫无目的。“假如有目标……对于其他人也许是好的，但对于诗人而言，这将是一种灾难。”没有目的，这和功利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。现实世界的面目，之所以越来越无趣，就是被各种目的所拖累。用诗意解除物质世界的笨重枷锁，所谓附庸风雅，算是一种方法论吗？



梅花图
画作/姚媛

阅读课

文/丁捷

最近，报刊亭主人王大姐引发我给自己上了一堂阅读课。办公楼下街边的报刊亭，已运转了20多年，种类之多，全南京罕见。我常光顾。王大姐一句惊人之语，忽让我刮目相看。她说：中国人一是钱少不读书，二是读书为快活。

她先说第一句话的意思。只要一班子大家挣钱不多，就会直接影响她的生意，报刊亭简直是经济发展晴雨表。举例：她这个报刊亭，因地处闹市区，受经济影响特别大，经济好的时候，最高利润也上过万，经济一般，维持在三四千。这个波动跟房价几乎是共频的。现销售总量下得厉害。

有读书看报习惯的人，不管经济怎么变化，不至于要靠压缩报刊开支。一般在压缩开支的时候，首先压缩精神消费的支出；事业受挫、清闲的时候，也较少以文化的方式

找安慰。

细想不无道理。前苏联解体后，很多商店因商品缺乏关门，但两种店不减反增。一是面包店，二是书刊店，因钱少了时间却多了，正好调整一下生活方式，活得更精神化一些。当时常看到面包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人们一手提着面包袋，一手全神贯注捧着书。仅此场景就可看到这个民族的两个优点：公共场所自觉有序；热爱阅读。美国作家狄克逊·韦克特写过一本《大萧条时代1929—1941》的书，专门观察上个世纪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。其中记录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，说美国和欧洲国家，大萧条时期几乎万业见衰，但文化却在萧条的二十余年间蓬勃兴起。比如美国读者文摘，大萧条开始时发行量25万份，大萧条期间猛增到800万份。《时尚先生》《传奇》和大量女性

刊物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出炉，并很快打造成畅销品牌。美国人为了兼顾节省开支和满足更大的阅读需求，还策划出版大量内容综合的报刊图书，使得文摘类刊物和综合日报也应运而生，找到了广阔的市场。

王大姐的第二句话，我理解意思是国人读书的娱乐目的很强。所以，纯文字的精品书刊越来越难卖。更多的人直接就舍弃了纸质阅读，一头扎进液晶屏。因为，那里更能找到五花八门的消遣内容。

我们这个民族能否调整好自己，面对科技和金钱的哗变，我自岿然不动呢。我们能营养平衡，穿着得体，然后，更多的是捧着一本书，遨游在知识、兴趣的海洋，穿越在他人和自我的情感空间，怎么就不是一种美妙快意人生呢！

读山，读史，读春秋

文/傅小平

在永康方岩五峰书院小憩。遥想当年，这里曾是南宋理学家陈亮设帐讲学之处。淳熙九年秋，朱熹访陈亮于此。四方学子趋之若鹜，颇极一时之盛。

如今游人参观后，会来寿山石室的茶舍小聚，叫上一壶清茶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你会想，当年先生讲学之余，可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？

往事不可追，却可以静观，让心沉淀。不觉感叹：要留下什么历史遗迹就好了。当地诗人回道：这石室就是遗迹啊，它什么都看到了。

如果石头能开口说话，会说出多少故事来。《红楼梦》，不也记的石头讲的故事？那顽石无力补天，被遗弃在青埂峰下，终于零落红尘，尝尽人情冷暖。这就对了，没有故事，再好看的石头也只是石头，有了故事，就大不相同了。这就好比是登山，为的也是读山，倘若少了人文历史，就少了很多興味。

朱熹亲笔丹书的“兜率台”，至今依稀可辨，也赫然可见宋高宗御书的“赫灵”照壁。题词像是有几分性情，何况这一手好字，写得是洒脱婉丽。

说来宋高宗御书，也是为方岩山上的胡公祠而写，这祠里供着胡公大帝。胡公大帝，姓胡名则，是一名清官，去世之后百姓为他立庙祭祀，敬若神灵，少不了传奇

色彩。

下山时，无意间看到蚂蚁搬家。像是在地上作画，或是在缝补衣裳呢，它们不学石头补天，补的是大地，那细密之极的针脚，再高明的裁缝师傅都做不出来。我退后一看，看到有一支蚂蚁小分队，像枝杈一样，在主干上横斜出去了。而此时看天色竟也暗了下来，起风了。

风在大树小树上吹出不同的音阶，错落有致汇成合唱，唱主调的是两棵大泡桐。76年前，当周恩来与黄绍竑种下时，还只是小树苗，如今却参天而立，像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当游客为好奇心驱使，想知道是谁种下了两棵树里的哪一棵，却连知情人难分辨了。

与当地文人在小溪间小聚。有白发老者问：谁能读懂永康人的眼神？那眼神是忧郁的。某人补充：那眼神里不是忧郁，是忧患。忧郁也好，忧患也罢，都只是说此刻看历史的角度，而历史却是超然物外的，就像是天街边房屋瓦楞上的草，它无风时静立，起风时摇曳，待到风停，依然静立如处子，它沉默无言，却像是诉说了一切。我们读山，读史，读的亦是春秋啊。